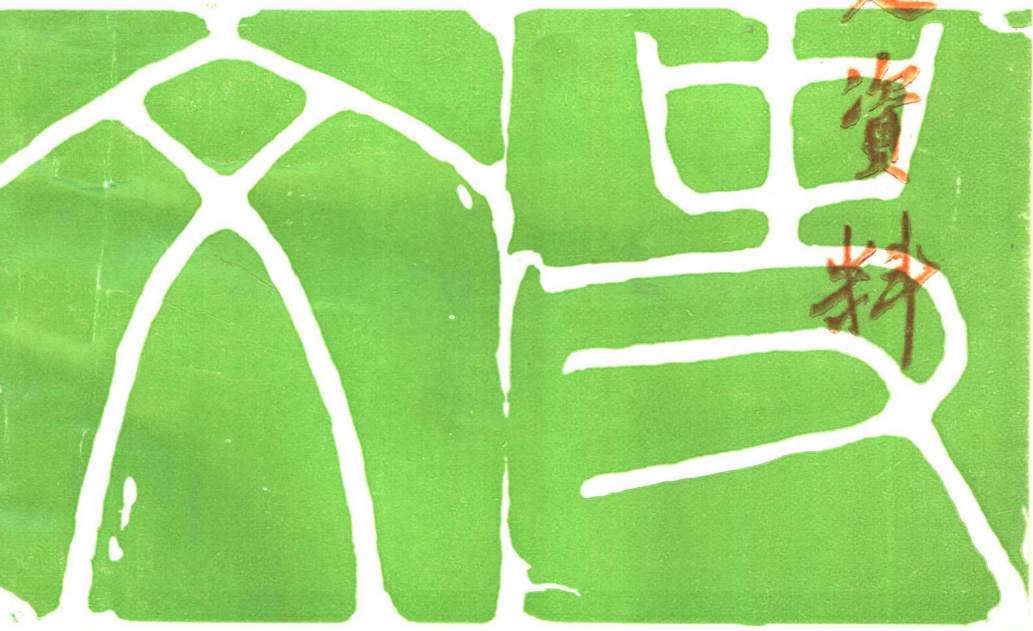


盐务与邮政

福建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盐 务 与 邮 政

福建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福州

福建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地址：福州五四路省政协大楼

★

福州市计委印刷厂印制
开本850×1168 1/32 5.75印张 145千字
1987年 第1版
1987年 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
国内统一刊号 CN35—1053 定价：1.20元

目 录

闽盐公有斗争记何公敢 (1)

接收时期 清理旧员和档案——坐帮提课——和
盘托出，涓滴归公——全省引地的瓜分

收帮时期 公有政策的酝酿和决定——擒贼擒
王，收办五府——两个月收帮总结报告——收回县
澳各帮——盐厘局、盐场情况及其他

围场缉私和设坨专买 接办泉州盐务总局——溪
尾盐埠被焚及其处理——围场缉私和购毁零星盐坎
——实行设坨专买

复辟和反复辟

再度收帮和西路自由商 面目全非的 全省盐政
——再度收帮——西路自由商和对卢部的斗争——
“福建盐运使”卖缺

刘鸿寿发迹之由来吴家琮 (78)

福建邮政五十年林忠友 (84)

帝国主义把持下的邮政 (1897——1928) 福建
邮政的创办——局所的逐步向内地扩展——邮运的
组织和扩展——邮递——邮政业务财务的概况——
邮政人事——喧宾夺主的“客邮”——初期的邮工
运动——邮权在名义上的收回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邮政（1929——1949） 国民
党统治初期的邮政——“闽变”前后的邮网和邮运
概况——邮、电合设——抗战时期的邮政动态——
抗战时期邮政所受损失梗概——战后邮政机构的调
整和邮路情况——战后邮政业务每况愈下——解放
前夕邮局里的怪现象

《福建文史资料》征订（176）

闽盐公有斗争记

何 公 敢

编者按：本省盐业生产历史悠久。清末，滨海产盐区即有霞浦、宁德、莆田、惠安、漳浦、诏安等14县。盐税历来是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也是旧时代官吏、盐商和走私之徒的重要生财之道。当年盐政腐败，百弊丛生，民受其害。

本文作者何公敢于辛亥福建光复后，出任福建盐政处正监督（后改任协办），以收帮改公、设局专卖等措施对盐政进行兴革。1913年至1917年，任泉（州）兴（化）盐务总局局长期间，在闽南各地实施围场缉私和设坵专买。1928年以福建省政府秘书长代理盐运使，复对盐政紊乱的局面，作了若干整顿，以挽颓局。他三度任职期间，盐政都有所起色；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未能从根本上革除弊端，使盐政真正有利于国计民生。

本文在叙述盐事的同时还介绍了民元后十几年间福建政局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和闽北、闽南一带地方的社会面貌。

一、接收时期

辛亥9月，孙道仁都督就职的翌日（按：即公历1911年11月14日），我和刘钟业（七元）两人并肩徐步到朱紫坊我老家中。行到四进廊上，遇见我父亲，老人家问：“你们两人做了什么？”（那几天福州城盛传某人做某部长，某人做某局长、科长等。）我答：“没做什么。”他又问：“盐务很重要，派员接收

了没有？”我答没听说，他就说：“你们两人去做罢。”我说我不会办公事，父亲听了反问道：“办公事有什么难？”

我们俩回头出门，踱往都督府参事委员会（后改称政务院），进去见他们正在开会。我问：“听说盐务很重要，不知已派员接收了没有？”大家面面相觑，无人作答。有顷，他们商量了一下，秘书陈承泽开口说，“就请你们二位去接收”，同时给了一张字条作凭据。我们便踱到盐道前（现叫鼓西路），直入盐道署大堂，看见一些象是书办和差役的人懒散地站着，我向他们告明了来意。消息传开，署里的人纷纷涌到大堂里来，人愈集愈多。从他们口中得知，盐署和官运总局人员自提调以下都走空了，只旧盐道杨昌颐（湖南人）和家眷还住在里边。都督把银库封了，派了一排兵驻在这里看管。我们便请见杨盐道。这位老人家出来了，他圆脸长身，满面油光，马褂长袍，很客气地请我们坐在一排公座椅的最后两张上。看了字条后，他交出一个印箱，内有一块长方形的、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的“福建盐道关防”和几个铜质小图章。我们收下后，他说，他打算立即带着回乡，但以人多行李多，颇虑能否安全上船。又说，他在衙中藏有50坛绍兴酒，愿全部奉送我们。我便唤驻军排长来，请他派几位弟兄好好地送杨老家眷行李上船，并说那50坛酒全部转送给弟兄们喝。安排毕，我们便离开了。

当夜，我们抱着印箱到参事委员会报告接收经过。他们宣布把盐务机关改名为“盐政处”，派何崧龄（我的旧名）为正监督，刘钟业为副监督。我向他们索取印信，陈秘书说由我们自己去刻。我们便自刻了一个四方的“中华民国福建盐政处印”。数日后，我们在杨盐道签押桌的抽屉中，发现了孙都督给他的信，要他仍旧维持盐务（都督和参事委员会声气不通，所以后者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又发现一纸都督对当时军务部请委林知洲为学生队队长的批语，是亲笔写的“私极，私极”四个大字，并盖了

“公忠”二字的篆刻图章。大概因为当时军务部长是林之夏（字凉生，林知渊的胞兄）、副部长是萧奇斌（字质卿，林知渊的姐夫），所以这样批。可能是杨昌颐（孙的同乡）看这批语太露骨了，把它扯下带回来了。

（一）清理旧员和档案

我和刘钟业商量，觉得须多几个人一同接收，刘推荐他的旧塾师吴敬丞为秘书，后又加推了刘崧英（少云）。我约了何道澹（叔静）担任行政科科长，又约了陈镛（乐天）担任会计科科长。

翌早，我和刘钟业又往盐署，刚走到大堂廊上，就被数十人团团围住，他们跪下打千，把我们吓了一跳，便赶紧告诉他们：“现在是民国了，没有这般礼数。”在许多老书办中，我们找了郑钦端（我九婶的胞兄弟，我叫他“九舅”）、陈士庚等几个人，请他们详谈现存员役和档案情形。据他们说，盐署案卷，除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门外，还有盐（盐场生产）、引（商帮引地）、总（盐务总商）等三门，共九门；有案卷数十百捆，有的重要卷宗还被实际经办人员留存家中；书办丁役等，花名2000多人。经过几天详细查询，发现实际办事的书办不外四五十人，许多花名是百多年来死后不换名，由别人顶替的。前手保留了“驿缺”这一权利，由顶充人员按月或按年给他若干酬金，好象租金一样。我以署中人员过去虽然是按劳取酬，各人收入额不一样（经办公文多的收入也多），但总可按各人全年原有总收入换算出每月的平均收入额，请他们公同核实评定一下，一律改用月薪制度。结果，最高收入的不过数人，月入四五十元；驿缺收入，有的年仅三、四元。这样，选拔淘汰结果，2000多名书办差役，保留下数十人，都按他们实际平均月收入酌增一些。花名驿缺全裁，但有遗孤遗孀的，按原收入数改发津贴，孤儿领到满16岁止，寡妇到死为止。

关于案卷，除吏部、礼部的全部焚毁外，其余分别重要、次要，派定专人分类整理保管，并追回所有原存个人家中的案卷，一律归档。在清理旧员和案卷两项工作中，郑钦端和陈士庚二人（接收后书办改称书记，后来又改称“录事”，郑钦端实际做了总书，陈士庚担任收发员和监印），对我们说了很多内情的话，对工作的顺利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极感需要的，是要物色一位熟悉盐务的人员来当总务科长（办公室主任），帮助我们主持一切。我们从官运人员（即旧盐大使）和商帮人员中去物色。先请旧书办们把旧官运人员中熟悉盐务的开一名单，结果开了20余名。头一名是张世黻（浙江人，老盐大使，以老成厚道著称），最后一名是汪守砥（字寰远，安徽人，曾当过官运总局的总务科长，不能不把他列入单内，但大约是为入刻薄，大家都嫌他，所以把他列在末尾），中间有张岱山（张世黻之子，以年轻能干著称）、吴枏（梅臣）等。我曾想请张世黻或张岱山担任总务科长，但张世黻自称老迈不就（实在也老了），张岱山已离开福州。在商帮人员中也寻访了一些人，但这些人多在自己办盐帮，不能用。我父亲提出陈通骏（字星甫，前清举人，时年60余）让我们考虑。陈曾任“校士馆”监督，当年我能参加留日学生考试，就是校士馆保送的，被录取后，还向这位监督辞行过；他当时是盐帮的“总出关”（即代表人），和商帮及官运人员都极熟识，为人又老成稳重；于是我们请他担任总务科长，这样，各盐帮安心，其他公事也易按部就班进行。

陈通骏上任后推荐林孝扬（字眉叔，黄花岗烈士林尹民的父亲）为南台溪海所所长，掌管“买海”，即向盐场购运盐斤和“配溪”（运盐斤往东西溪）。林一上任就遇到了难关：盐库原有的若干万元存银，经孙都督派兵看守，已在近几日被开库取尽了；而盐务的官运局是营业机关，没有营运资本，便无法维持官

运局面，至于本署人员薪俸公费等等开支，尚在其次。那时全省财政枯竭，各机关嗷嗷待哺，盐务想向财政部领钱来用，也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查清旧盐场官员和商帮对盐署的欠款欠课，派员四出催收以救急，但成效极少。正焦虑间，不料竟得到一笔“天外飞来”的收入。

一日，中国银行派员找我，给了我一张2万元的支票，说是前清杨盐道托他转给我的，因为他很感激我派兵护送他的家眷行李安全上船回乡。他记起解往北京的最后一批10万两盐课，盐道从中照例应得“平余”（一种公开陋规的名称），有2万元，按例应归后任收用。我们便携了支票向参事委员会报告，并请将这一笔款作为官运局营运资本，当时得到参事委员会同意，才过了这一关。

旧盐务的专门用语特别多，很令人讨厌。譬如大家说的“吴厝馆”，它的实际主持人吴继箴（捷哥）通用的帮名是“吴盛记”，正名却是吴盛泰，而写在公文上又成了“李玉成、郑光远”。郑的实际“引地”（销盐区域）是除浦城县外的旧建宁府属，却被大家叫做“建瓯阳崇南”。这“建”字指的是“建安”，“瓯”字指的是“瓯宁”，也不是当时使用的县名。这一切都得一一向老盐务面询，才能了解，否则看公文只会莫名其妙。至于全省产地、引地、溪海、运道、缉私要地等等，更非只翻全省地图所能了解。我只好一面阅读“福建盐法志”、“盐务杂志”等书，一面向星甫老先生请教。星甫接事伊始，来客特多，直到上灯还在拟批公牍。我只得待他事毕回家，随到他家中，将疑难一一面询、笔记，有时闹到夜深，便在他家过夜，这实在太累了老先生，而那时我才二十出头，当做夜读，却无所谓。

为逐步扫除旧官运商帮中的积弊，盐政处工作开始之初，我们还以给钱或委派工作的方式，鼓励旧官运商帮人员献出秘本，

收到颇多，有的内容很详尽，还有许多人提出了整顿条陈，此举对于工作的开展极为有利。

（二）催科——“坐帮提课”

在采用“坐帮提课”办法之前，我们对官运旧员的欠款和商帮的欠课，只是一味地紧追，对屡催无效的予以处理。如浦城官运局邹国桢屡催不缴，只得将其撤换，派刘友惠去接收并派张善和（清河军官学校学生）去担任缉私队长（巡缉从浙江越境侵入的私盐）。福州高大成（鳌峰坊高家）欠课最多，屡催无效。我探知主管人是刘友惠的姐夫，便于旧历除夕请刘友惠邀他来署，把他扣着，结果友惠姐姐把金镯换了缴课，我们才让他回家过年。后来采用坐帮提课办法，即派员驻在帮中，就其逐日收入扣留若干，作为课款，自行解省。对“沙（沙县）永（永安）帮”就是用这种办法才把它管住了。

旧兴化府属的莆仙帮，是本省清末最大乡绅、前清邮传部尚书陈璧（玉苍）所领办，这帮惯于欠课，一向催缴无效。我知道陈家不是没有钱，就用力紧催。陈家和我家两代姻亲，我五伯父（刚德）便把一封陈璧给他的信与我看，内说“絮（陈璧小名）现今所处景况和‘慎记帮’（我五伯父曾领办过的商帮名称）以前的境遇相同”。这句话的用意是说：当你家“慎记帮”被前清盐道陈璧迫勒很紧时，是我替你解了围，今日我被你侄儿所迫勒，你也应该替我解围。我平素很尊重我的老伯父，但此事却无法通融。过一些时，一日清晨，交通部长黄乃裳（戴庭）老先生忽来家找我。我请示来意。他说老友陈玉苍要他来求我把莆仙帮事作一了结（黄陈二人，是举人同年，交情甚好，黄带闽清人赴南洋北婆罗洲创立“新福州”——诗巫，陈曾资助）。我说：

“那好，请他把近欠盐课3000元缴足，我把帮收回，其余旧欠，不再向他索取。这样，彼此两了如何？”戴伯答应了。陈家果然缴来3000元，我便宣布革帮，改为莆仙盐务局，这案算是结了。

不意民国2年我由日本回国晤见林惠亭（时任福建盐政处督办）时，他很得意地说，“你未了的收帮工作，我都把它办结了”，并出示一个统计表。我发现上写给莆仙帮帮价3000元，便说：“当时追缴莆仙帮欠课3000元后，再以革帮作结束，何以反倒给了他3000元？”他默然无以应。此番根据《闽盐月刊》第4期“特载”的材料、编制《闽盐公有收帮给价一览表》时，又发现最后给予莆仙帮的帮价不只是“3000元”，而是“6000元”，只好付之一笑！

山西票号“源丰润”是前清旧式银号巨擘之一，在福州杨桥巷有个分号，主要来往顾客是前清官僚。一个革命，把它的根基全然摧毁了。它短欠旧盐道不少款项，员役逃散一空，只余一座房屋，我们把它没收了。里面房间相当多而且完整，家具也很坚固齐备，且有银库。我们因为旧盐署破烂不堪，大而无当，便把盐政处移过来。还在它的箱柜中发现了一些金银首饰，全部移交财政部点收了。

在源丰润邻近，有张世骥、张岱山家的房屋，张家父子二人都拖欠不少课款，屡催不缴，我们也把房屋没收了，把所有家具都送给林秀军作开办“福建体育学校”之用。至于张家所藏的一些先代画像和图画，以刘鸿寿为张岱山（刘本想找张来闽当总务科长）请求，全部发还。

后来，对没收的房屋做了这样的处理：以收回商帮都应给予一部分现金为补偿，而有的旧盐商又喜欢这些房屋，便把它们折价抵发，从而节省了现金支出。

（三）“和盘托出，涓滴归公”

盐务积弊之深，名目花样之多，在财政机关中首屈一指。我们责成官运、商帮双方主管人员据实填报。在“和盘托出，涓滴归公”这一口号下，在当时革命气氛尚浓厚的环境中，公开布告，“凡舞弊的，一律‘军法从事’”。并派高子伦（留日学

生，年纪很轻）等分头前往各地调查视察。高子伦担任“西路”（水口以上各帮），利用该地官运、商帮犬牙交错、积不相能的情况，让他们彼此互相揭发弊端，由此得到了一些材料，把许多陋规废止了。就此，在上游盐帮工作了20多年的陈建侯（为人正直，后来为张岱山所提拔，调往北京盐务署充当科长）曾说：“光复后一段时间，上游盐务弊绝风清，为余生平所仅见。”高子伦在监理西路许多盐局、盐帮收些效果后回省，要求用“西路监理处监理”名义，再往坐镇西路，我们答应了，并在11月30日夜发表了此项任命。可惜高子伦这番再到西路，视察到他家所办的“高美全”（也叫高大成）盐帮——沙永帮的头上时，为其叔、伯、兄、弟等所包围。这位洋装革履，身插二枪（外套口袋中一边一把，用以自卫），一向雷厉风行（固然有些蛮干）的监理就挺不起来了。前此，我们对沙永帮用坐帮提课的办法把它管住，但高子伦一到沙永帮，这办法便被其所阻，不能彻底实行，于是西路盐务和省内盐署中人，众口哗然。我们也认为子伦犯了这一错误，威信完了，便立即撤销西路监理处，召高返省，改请他筹办盐务研究会，和高翊台（台仓局局长，留日学生）一起翻译“日本盐专卖法”及其细则等，以供研究闽盐改制之用。

这一时期，是否大家都不敢舞弊了呢？不尽然。记得那时，我们为着堵截海船运私在沿海一带抛卖，就在平潭岛后面娘官地方设了盐厘局，征收往浙盐厘，并查缉私盐船。当时山腰私坎所产盐斤全是无厘走私，这一关隘的责任重大；加以私盐船人蛮而众，且有枪炮，因此许多人不敢承担这一开办责任。高子伦向我们推荐一个姓林的人（大成馆秤手出身，绰号“大成二”），说他敢于冒险前往。我们认为不妨“使贪使诈”，便派林前往开办。他果然很快办开了，但同时也舞弊起来，收了“私礼”，被我们派驻娘官的哨兵黄某当场看见，并且掌握了证据，驰回报告。我们便调林回省，以人证物证俱全，他不得不承认。当下我

下了决心，要惩一儆百。夜间坐轿入都督府，找到政务院长彭寿松，面告了情形和决心。彭答应了，在我写下的“请准予枪决”的条子上签了字。我将条子密藏身上，决定翌日实行，而且对任何人都不说这件事。翌早，我到盐政处，却不料庶务员刘学赞（绰号“贼赞”）报告，昨晚寄押在庶务处、睡在他床铺上的林某，已经吞服鸦片烟自杀了。

再举一个例。当时盐仓前盐仓很多，旧时都是散装，年久落卤后，其实存数和“仓存报表”所填写的数量必不相符，这点我们是知道的。但不符多少，管仓的员丁依靠他们多年的老经验，肚子里是明白的，而公家却无从捉摸。

我们认为，要彻底处理，只有盘盐清仓一个办法，于是耍一些盐仓清盘仓存。之后，把台仓局（管理南台盐仓前各仓）的报告翻开一看，首列便是“5分余多少斤”。按规定，每百斤盐在5%以内的损耗是合法的、可以报销的。但这里写明“5分余”完全缴上，是一厘一毫都不曾消耗了。其次是“3分余”、“2分余”、什么“余”的……自小白摺第一页开头起密密麻麻、端端楷楷地写下来，一直写了四、五页。何以会有这么多的“余盐”呢？原来，管仓员丁在收盐时，就在预先估计好的盐斤实际损耗之外，多收了若干斤，为以后的盗窃留了余地；在出仓时，每百斤少发若干斤，又留了一个盗窃的余地。这一进一出时，执秤老手们上下、轻重其手的本事高明得很，甚至在秤杆和秤锤上，也先做了手脚，无须倚靠手法了。何以缴盐的海船户或收盐的溪船户，都默默一言不发，听任他们这样做呢？这在最初几次，海船户和溪船户是被骗或被迫的；而在知道管仓员丁必然这样做之后，便设法把这项损失转嫁他人。例如海船户就把这损失转嫁到“晒户”（利用天日制盐者）身上。晒户呢？当他们察觉海船户在每百斤盐中定要多称几成后，也就在售盐叫价时预先把这几成加入估价中，结果，加重了盐本，这一负担，最后转嫁到

买盐的老百姓身上了。

一切弊端，在秘密公开化后，关系双方彼此心照不宣，形成了他们所谓的“潜路”（即规矩），凡掌握了潜路的，彼此都会相安无事。但日子久了，上级职员也知悉了这些潜路，便在“化私为‘公’”这一藉口下，把象上述的“5分余”等，提作上级人员的特种公摊额外收入（这一弊端便是内部人人皆知的“陋规”的一种），为上一级所占有了。下级原享员丁不甘心于权利丧失，便炮制所谓“3分余”、“2分余”，以满足他们自身的欲望。但过一些时候，这些“余”又会为上级所提取，于是再设法造出什么“余”、什么“余”来，愈演愈多，生生不已。这样，台仓局的那一份“白折”中，在“余盐”的名目下居然写满了四、五张纸，就毫不奇怪了。

再举一个小例，偏僻地方盐埠的员丁，有的每早晨兴，便向售盐箩上面，象晨起浇花一样，喷上些水。盐售出时，以所喷水未干，增重部分的收入便入了这些员丁的私囊。这样做并不影响公家的仓存，况且，在当时凡冠有“官”字头的商品，都是“只此一家”，盐叫“官盐”、米叫“官米”，老百姓买得到手就算满意了，哪敢多讲一句话呢？

盐务只有盐和钱两项的进出，所以，陋规除“余盐”一项外，还有一种叫做“银水”的花样。这是自盐法道所享受的“平余”起（“平”是天平，“平余”是银块用天平称量后余下的部分，上文所述杨盐道转给我们的2万元便是“平余”），一路直到盐埠，都有这一项陋规。“银水”产生于不同货币间的差价，当时市面使用的货币种类庞杂，有银元（包括完整的、残缺的本国银元和鹰洋、杖番等外国银币，时价各不相同）、银角、铜元、铜钱等，这些货币间的差价随时不一，于是，在钱商的操纵下，银就生出“水”来了。譬如，曾有一个长时期，福建每角银角折合铜钱106文。官盐埠在售盐时，若将每角只作100文计

价，这样，每角可得6文。积累起来，这一笔收入，你看多不多呢？所以，象安溪、浦城等官运局和诏浦盐厘局等好缺，每任局长的年收入，据“秘本”逐条列举，都是好几万元（有的竟达10万）。

（四）全省引地的瓜分

福建盐务引地，除汀州府属各县归广东管辖外，全省大致分为东、西、南、北四路和“县澳”。“东路”指福宁府属各县，有陈叔范（陈礼刚）的宁德帮和八都帮、霞浦帮、福鼎帮等四商帮。“西路”指延（平）、建（宁）、邵（武）各府属引地，又按延平以上闽江水路的分支情况，分为东西二溪及沙溪流域。

“东溪”指建瓯至崇安一带（这一带唯浦城设有官运局），有吴盛记的“建瓯阳崇南”盐帮和林伯云的“东溪帮”。“西溪”指邵武府和延平府属的一部分，即光（泽）、邵（武）、建（宁）、泰（宁）、将（乐）、顺（昌）各县，有以徐乔土为代表的“永昌隆”和郭成亨、魏万金、陈顺记（陈星甫）及林尚宗的“西溪帮”等5帮。沙溪流域，有高美金的沙永帮和南平至水口间的“尤南（尤溪）帮”、“黄田帮”、“鹭鹭帮”3小帮。如此，西路共计11帮。“南路”指闽县、候官、闽清、福清、平潭、江阴、永福各地，有龚承昭的“南路帮”（北门龚易图家）和“永福帮”、“福清帮”、“平潭帮”等四帮。“北路”指连江、罗源，有后街叶大焯家的“长连（长乐、连江）帮”和罗壶（罗源、壶江）帮”。“县澳”指兴化、泉州、漳州三府属（包括龙岩、永春二州），有莆仙，晋江，惠安，同安，溪岩泰（龙溪、龙岩、长泰），平宁（漳平、宁洋），南靖，海澄，漳浦，云霄，诏安等12帮；就中以官巷林家（林炳章，林则徐裔孙）所办的“溪岩泰”帮为最大，以陈璧所办的莆仙帮为最有势力的（敢于拖欠盐课，莫奈伊何）泉属以晋江为中心，又分作东西溪，“东溪”有永春官运局，以永德大（永春、德化、大田）为

销盐区，“西溪”设有安溪官运局，其地的湖头大盐埠，以肥缺著称。

以上共33帮，除浦城、永春、安溪三县设有官运局外，全省引地都被商帮瓜分尽了。不论在哪个时期，不同商帮的引地互相重迭或互相穿插，都是常有的事，这种现象反映了新旧绅富势力的消长和盛衰。

在清末各盐帮中，享有“四大金刚”称号的是溪岩泰帮的林家、莆仙帮的陈璧、长连帮的叶大焯和福州东牙巷的邵家（当时已趋没落）这四家，当时，它们是很有势力的。作为一种封建性的垄断经济势力，各盐帮有钱有势，在地方上作威作福，鱼肉乡里，地方人民对“盐馆”都侧目而视。这些盐帮都各为其私，想在这种包商制度的基础上整顿盐务，无异痴人说梦。因为整顿盐务，首先要堵绝私盐来源，而这些商帮不但没有力量，而且根本没有认真缉私的意图。他们所注意的，是在于以贱价冲销的办法侵蚀邻帮的引地，在引地的交界处，彼此设埠争销并设置巡缉队，防止邻境冲销之私。商帮的总帮，一般都是麻将、鸦片俱乐部，办盐帮的家庭一般都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许多商帮靠着盐馆招牌，滥举帮债，吸收存款，先以重利诱引，终于本利无着。甚至把盐埠员丁名额当作缺份，某人想担任某缺，要先付若干“押柜金”，等于捐官鬻爵。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帮东舞弊，瞒骗公家，它的帮友，也相率舞弊，瞒骗帮东，如此层层舞弊，日久月深，积重难返。某夜，我在朱紫坊家门口（大约正在“迎会”，街上很热闹），右邻70多岁的陈莲仕老伯（做过龚家盐帮总管多年，已退老了）叫我到他身边，拍着我的头说：“十八（我的大排行），盐是‘盐糊涂’，你莫想把它搞清，只能慎重对付。”我听了这些话，固然知道这是陈老伯对我的爱护，但心里很不以为然。我口里虽然答应着“是”，心里却想着：你说的是“盐糊涂”，我偏要使它不糊涂。